解放初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五）

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3年到1956年，市委和政府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遵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通过一系列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有计划有步骤地完成了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将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历史必然。1952年，银川郊区完成了土地改革后，对银川市半农半商的私营商业户发展造成了困难，再加上进货渠道、资金、经营管理等诸方面的问题，使一些私营商业户不能单独经营。为此，国家采取有关发展私商的政策，要求他们并店联营或根据自愿的原则，转为农业生产。1955年，经银川市政府批准有81户要求并店联营（并店联营也是一种公私合营的形式）。根据他们所经营的项目和品种，组成了2个经营小组，13个联营店。另外，银川市政府还批准42户转为农业生产，除自有土地341.5亩外，政府又为其批准解决了29.8亩土地，并补助购置农业生产所需的费用610元。

1953年后，国家陆续实行粮食、棉花、棉制品、食油及肉食等主要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对金属、煤炭、皮毛、烟叶等重要原材料实行计划控制和供应。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的开展，加工范围的扩大，自由贸易缩小了，有计划的市场逐步扩展。这就使私营工商业者，失去了自由买卖的可能性，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有计划地逐步将这些私营商业改造成为国家经销、代销或代为批发的行业，从资金和货源等方面全部或部分由国家统一调配；在经营管理方面，国家进行帮助或指导，逐步使这些私营商业适应国家经济的管理。截至1955年底，银川市私营商业为国家经销、代销或批发的共371户，资金总额为41万余元，从业人员432人。其中棉布业占总数的92.5%。

到1955年底，银川市社会主义国营和集体经济不断壮大，单个私营企业和个别私营商业已经实行了公私合营。全市参加公私合营的工商业户有395户，从业人员426人（包括家属），资金在2000元以上的有106户。另外，全市还组织起了手工业生产合作社12个，供销生产合作社1个，生产小组8个，社（组）员458人，占手工业总人数的18.6%。

此时，国营及合作社营商业占商业总数的60.7%，年社会商品零售额为2107万元。私营商业1954年营业额为1026万元，而1955年只有647万元，降低了36.94%。国营及合作社营业零售额由1953年占市场零售比重的58.5%，上升为1955年的66.15%，私营零售额由1953年的41.19%降为1955年的33.65%。总体上看，国营和集体经济在银川市已经占有绝对优势，私营工商业要发展是非常困难的，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道路是大势所趋。

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在社会主义经济和半社会主义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形势下，资本主义工商业日益失去了独立存在的社会条件，私营工商业者日益感到他们的经营发展前景不佳，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公私合营或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出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邀集中华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座谈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并在座谈会上讲解了有关方针政策。11月，全国工商联举行第一届二次会议，通过《告全国工商界书》，号召全国工商业者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接着，中央政治局又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会议，会上还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此草案1956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作了个别修改后，正式定为决议），成为全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指导方针，为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制定了政策依据。 （据银川党史网）

华夏独绝奇石山 旅游胜地名在外（二）

在作家眼中，中华奇石山又是另一番天地。石嘴山市本土作家赵晓宁在《秋游中华奇石山》中是这样写的：

在微风、细雨交替的上午，我从侧门进入“中华奇石山”。

顺着小路来到“青少年道德教育园”，两侧的座座石碑，掩映于蓑蓑芳草中；石碑上的伟人们或沉思，或远眺，或微笑，或絮语，雕刻得栩栩如生，仿佛活了过来。石碑上的物理学家严济慈、桥梁学家茅以升、地质学家徐光启、唐代的发明雕版印刷的毕昇、唐代杰出天文学家僧一行等静静“伫立”。茂密茁壮的野草伴着石碑和小路，所有中华古今自然科学家，被雕刻在刚硬坚实的贺兰山石头上，永驻在时光里。

小路尽头的右面，“中华奇石园”正在修葺扩建，未名鸟儿在牛毛细雨中鸣叫，传递着秋的声息。信步来到“诗词园”，只见那些或刚劲，或飘逸，或遒劲，或端庄，或秀丽的书法，古今脍炙人口的诗文被雕刻在石碑上，被岁月的金沙打磨着，被流年的风雨洗涤着，愈加莹润光滑，让中华传统文化在此得以彰显和永存。

在楷模碑林，毛主席遒劲潇洒狂放的书法雕刻：“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石碑上有孔繁森、焦裕

飞来石。

禄、张思德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者；有石嘴山市在新中国成立前为革命献身、被敌人残酷杀害的革命烈士李双双、任天才等英雄慷慨就义的雕像，缅怀和追忆之余，让人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这美好的家园，这丰富多彩的大千世界，让人无限感怀与珍爱生命和美好生活的宝贵。

在寻觅中，见到不止一处青青野草和大片的昔年干草，同在草地上静卧，它们的气息混合弥散着让人心动的气息—那是乡村的气息、大自然的气息。那好闻而怡人的气息，就像老旧与新鲜时光的交替、和谐共守，散发着各自的美好气韵和情怀。

黄的、红的、翠绿、墨绿、嫩绿的树木枝叶，轻轻摇曳于灰色石子儿小路旁，弯弯小路伸向未知的幽深远处；一大片绿草和树木的空地上，稳实地站立着一些高大的硅化木。石化的树身已由过往的粗粝变幻得莹润绵厚，透出殷红、灰棕的色彩，时光停留在它们身上，带着岁月润泽之美，带着沧桑的浓重影痕，留下了年轮的美丽和印记，记载着岁月的沧海桑田。

鸟儿啁啾声将人引入一条羊肠小道，这里阴凉而僻静；尽头的湖中，荷叶如一片片绿伞铺陈水面；芦苇瑟瑟飘摇，扬着暗红的花穗伴在荷塘；岸边垂柳依依撩拨着湖水，荡起圈圈涟漪；远处的小桥静静地横在水面，等待着生灵与时光的莅临。

在“世界名人园”，有航海家麦哲伦、戏剧家诗人易卜生、高尔基、柏拉图、贝多芬、爱迪生、弗洛伊德、舒伯特和救死扶伤的温柔天使南丁格尔等许许多多国外名人，他们或英俊、或睿智、或坚毅、或慈祥的面容，似在那里吟哦酝酿、沉思不语、布调千军万马于胸壑之中，神态皆可读可品，让人倍感亲切和难忘。

走了很久，终于来到“岩画园”，刚进入就被一种神奇、神秘的气氛笼罩。一方方巨大的贺兰石上，雕刻着远古的岩画。那幅著名的太阳神岩画，醒目耀眼，散发着阳光和明朗，把阴凉灰蓝的天空“照”得和暖明媚起来。岩画将贺兰山北远古游牧、农耕民族的狩猎、歌舞、祭祀、劳作等画面生动地重演；散发着浓浓的人文气息，历史穿越时光的隧道姗姗来到眼前……

（据石嘴山市档案馆）

解放初期清剿土匪斗争（二）

1948年春，三边地方部队主力转战陇东，牛化东、曹动之带领三边各县游击队坚持吴旗山区的游击战，并先后在张元峁、吴井战斗中，击退了张红芝清乡团1000余人的骚扰，消灭了两个连100余人，保卫了三边地委、专署和军分区领导机关与后方的安全。

1949年7月，曹动之率领三边军分区司令部先遣联络组从吴旗到张家畔，迎接由西北军区独一师、独二师组成的黄罗斌北线兵团，一路西进收复了安边、定边、盐池县城，并进到同心下马关一带，配合十九兵团向宁夏进军。1949年9月宁夏解放后，曹动之任宁夏军区副参谋长。

1950年3月31日，中共宁夏阿拉善旗工委正式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命曹动之为中共阿拉善旗工委书记。

1950年7月11日，曹动之去银川参加中共宁夏省第一次代表会议。中旬定远营街上谣言四起，匪特公然扬言要攻打定远营。旗工委在家的人员积极了解动态并向民族上层人士做工作，要他们正确认识形势，积极与匪特的破坏活动作斗争。7月16日，旗工委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分析了定远营的形势，认为阿拉善旗上层不会发生大的问题，但是担心匪特挑拨利用上层内部矛盾制造暴乱。会后即将郭栓子土匪要袭击定远营的谣传、阿拉善旗内部两派的动态写了报告派刘文章骑马从樊家营小路送到银川。曹动之当即将情况向省有关领导作了汇报，并与有关方面对剿匪问题及阿拉善旗局势进行了分析，交换了意见。在省党代会会议尚在召开期间，曹动之即于7月21日乘一辆私商的运货汽车赶回定远营。当时银川到定远营尚无长途班车，路况甚差，汽油缺乏，这辆靠木炭发动的汽车，120公里的路程走了3天。临到定远营附近的红石头村时，车又坏了，曹动之步行10余公里于7月23日才赶回定远营。

1950年7月24日，曹动之主持召开旗工委扩大会议，分析阿拉善旗形势，研究了防范土匪袭击和做好上层两派稳定工作。会后，曹动之出面请罗巴图孟柯、陈爱尔德尼巴图副主席及旗政府秘书长巴文峻召开保安总队中队长以上干部和旗政府、公安局科以上干部会议，讲形势，讲社会治安，谨防特务造谣破坏，明确指出地方治安是政府和保安总队的责任，明确告知他们，旗工委和宁夏派出机构干部的安全要由他们负责。曹动之从最坏处考虑，估计到了匪特袭击的危险性，在工委扩大会上特别强调，旗工委、保安总队政治处和宁夏派驻机构的党员、干部要高度警惕，要武装自己，保卫自己，如果土匪来袭击，要坚决抵抗，要从最坏的方面着想。曹动之坚定地表示：“我们就把命交给这个地方了。”

经过两天紧张的部署后，曹动之于1950年7月26日带着政治处干事杨万山、警卫员张永祥三人骑马又到银川参加省委会议。

1950年7月31日凌晨，郭栓子匪帮的谢占奎勾结阿拉善旗叛匪孙祥、陶克图巴依尔，带领匪徒60余人，携步枪42支，机枪1挺，分3股袭击定远营。谢占奎亲自带20余人，机枪1挺，从南梁下去攻打西花园的盐务局，企图夺取盐务局缉私队的枪支弹药；孙祥、吴国昌带20余人由河沟进入市区，孙祥带一组8人去电讯局抢电台抓台长；吴国昌带一组袭击贸易公司；抢劫钱财物资；陶克巴图依尔带10人占据定远营城北制高点营盘山，牵制城内保安队。

战斗最激烈的是城外盐务局和贸易公司。平时，盐务局只有十几个工作人员，盐务缉私队的两个班有近20人。前几天，宁夏盐务局从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野战部队转业分配来缉私队的指导员和5个班长，正在此等待分配。吉兰泰盐池缉私队4人，准备去银川，当晚也住在盐务局。这样当晚集中在盐务局的缉私队就有30余人。旗工委扩大会议后，盐务局局长李文琦、缉私中队长王殿辉和指导员立即开会，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土匪袭击定远营前3天，李文崎带领缉私队员在外巡逻。

贸易公司和银行金库10个员工，除4个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外，其余都是新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有6支步枪和1支短枪。旗工委扩大会议后，为了防备土匪袭击，贸易公司副经理贺荣兴在店铺房顶上修了一个小土岗楼，还准备了一箱手榴弹。员工轮流放哨巡逻。7月30日晚，公安局局长李树德侦知土匪要袭击定远营的情报后，派人向贺荣兴作了通报，并把宁夏派来的税务局局长彭彦林及郑占科等共5人叫到公安局，发给了5支步枪，并让彭彦林跟着自己，以加以保护。贺荣兴立即去盐务局告诉了李文琦。鉴于贸易公司防守力量薄弱，旗工委曾决定从盐务局缉私队抽1个班支援，盐务局派了小队长唐连明带两名战士支援。当晚就隐蔽在店铺房顶上警戒。

旗工委在定远营城内二道巷原女子学校一处院内，干部和工勤人员只有15人，多数同志都配发了枪支，夜间轮流放哨。

罗巴图孟柯副主席得知土匪可能来袭击时，对定远营城内防守也作出了周密部署；命令保安总队部队上城防守，为防匪特乘乱破坏，严令部队不准随便开枪，不准开城门；事先他还给旗财政处和延福寺的喇嘛发了一些枪支，武装待命。保安总队政治处政委朱子春，也警觉地严密控制了宣传队少数阴谋叛变分子的行动。

1950年7月31日凌晨2时，土匪发动袭击后，在城外南大街抢走了电讯局的无线电台，抓走了电讯局长周明富。盐务局和贸易公司、银行金库的员工干警，对匪特的袭击进行了坚决的抗击。盐务局指导员夏春朗看出土匪的机枪是主要威胁，便集中三支步枪压制射击，终于把敌人的机枪打哑了。贸易公司副经理贺荣兴发现土匪已经爬到房顶与防守干警激烈枪战，并严密封锁了上房的通道，便机智地带领员工从库房搬出棉花包垫在地下，搭梯子从另一处冲上房顶，守护住小土岗楼，打退了土匪，金库主任李克金，盐警小队长唐连明英勇负伤。9时，旗工委郭全德、张佶带领工委和保安总队政治处八九个人乘旗政府的一辆大卡车出城支援，神枪手张汉卿在三道桥打伤了一个土匪。在城墙上保安总队的守城战士也打死了营盘山的一个土匪。中午11时许，土匪一死两伤，经老陵滩、哈拉乌窜回贺兰山。

（据银川党史网）

移民岁月 第一百零九期 YI MIN SUI YUE

病人的康复是我最大的快乐（二）

——记宁夏医学院原院长陈树兰

上世纪90年代后，陈树兰把主要精力放在人体最重要的器官心脏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和研究上，成为自治区著名的心脏内科专家。被誉为让心脏健康律动的人。

有一个来自宁夏科学进步方面的统计；上世纪70年代初，宁夏急性心肌梗塞住院病死率为37%，内科中毒性休克的住院病死率为39%，在陈树兰的带领下，心内科团队应用溶栓、冠状动脉介入疗法、尽快开通闭塞血管挽救心肌、使急性心肌梗死死亡率下降至10%以下。陈树兰说：“永远把病人的健康放在第一位是我工作的重要动力。”

陈树兰出生在吉林省长春市，家中八个孩子中她排行第四。父亲早年接受过高中教育，在当时也算是个算术功底很强，通晓古今之人。父亲青年时就在长春市政府当会计。尽管母亲文化程度低，但对孩子上学十分支持，全家靠着父亲的收入勉强生存。

陈树兰：小时候家里条件不是很好，听母亲说我生下来后没有母乳，是靠吃杂粮面糊糊长大的，所以从小身体也不好。庆幸的是尽管生活拮据，但父亲还是把我们几个孩子都送到了学校。在距离家不远的地方有个公立小学，我6岁的时候跟着9岁的二哥一起上学。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教育普遍落后，女孩子上学更是十分少见。虽然父母支持家中的孩子读书，但还是有重男轻女思想，家中的大哥是父母重点培养的对象。陈树兰上小学时完全处于散养状态，学习成绩的好坏父母从来是不闻不问。她说：“在重男轻女的社会，家里能够让我上学已经算是很开明的了。”但在一个动荡年代和被日军占领的地方，一个女孩子要想继续诗书仅有开明的父母和优异的学习成绩远远不够，在随后的求学路上，她差点与继续读书失之交臂。

陈树兰：尽管我读书时年龄还较小，但知道家里的条件差，更明白如果不努力读书，就有可能半路退学。每天放学后除了帮助妈妈干活外，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上。也因为学习成绩好，小学还跳了一级，这也算是减轻了家里的一些负担。中学考到了吉林女中，离家很远，要步行一个半小时，每天早晨起床很早，从家中带午饭，晚上回到家一般都是很晚了。因为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爆发，经常有飞机轰炸，老师怕学生出事，天天放学后都把我们送到校门外。但我那时候根本不想早回家，经常是等着老师离开后，我再偷偷的跑回学校、在防空洞内借着洞外的余光看书，把作业写完，也不知道饿。

陈树兰的小学、初中时期都在发奋读书中度过，能够读书对贫困家庭出身的陈树兰来说已经是很大的幸福，她十分珍惜上学的机会，哪怕天天早出晚归。

（蔺银生 撰稿）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银川地区的青年学生运动（上）

一、革命火种在银川的传播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银川地区的爱国青年纷纷觉醒。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全国掀起了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残杀中国工人顾正红的爱国运动。消息传来，宁夏五中八师的师生率先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声援上海工人的反日爱国斗争，在塞上古城掀起了反帝爱国斗争的热潮，这是宁夏府城青年学生第一次有组织的爱国行动。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国民军联军在五原誓师后，于11月28日由五原抵达宁夏府城，同年冬，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还在宁夏府城举办了一期马列主义学习班，吸收五中八师的青年学生参加，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宁夏府城的首次公开传播。在国民军联军中担任政治部部长的中共党员刘伯坚讲授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概论》等马列主义著作。通过学习，一些进步青年了解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懂得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概念，懂得了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的道理，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推向了高潮。

1926年9月，时任刘郁芬部政治处负责人的钱靖泉，赴陕北与当地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后，带领李临铭、牛化东等中共党员和进步青年30余 人，途经宁夏赴兰州学习。当时宁夏没有中共党组织，为尽快建立地方党组织，发展本地革命力量，应驻宁国民军联军中党组织的要求，将李临铭、贺维新、马思然、陶振亚、郭维华5名中共党员和一些进步青年留在宁夏工作。这些留下来的中共党员和驻宁国民军联军宣传队及中山日报社的中共党员马云堃、贾一中等人，在宁夏府城共同成立了宁夏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宁夏特别支部，李临铭任书记，马云堃负责常务工作，贾一中负责共青团工作。据中共中央西北局党校移交给陕西省档案馆的《宁夏党组织的创建》记载：“当时入党有8人，入团的有三四十人。”经查证核实，当时在银川本地发展的党、团员，多是五中八师的学生。

二、蓬勃发展的学生运动

（一）宁中学潮

1930年秋季开学时，宁夏中学因助学金发放不公，引起部分学生的强烈不满。在进步教师的支持下，一部分学生发动了学潮斗争。宁中学潮使宁夏当局十分震惊，他们派军警包围了学校，按照校方提供的名单，抓捕了十几名进步学生。 学潮轰动了宁夏省城，社会舆论和学生家长都站在要求公正、民主、进步的学生一边，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当局被迫释放了被捕学生，但仍然坚持开除了梁大均等进步学生的学籍。这次学潮斗争，打击了落后势力，保护了新生力量，使学校的领导权掌握在了进步教师手中，为中共党组织开展革命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宁安堡护路队兵暴和小南门兵变

1931年4月，参加宁中学潮的梁大均等人相继回到宁夏省城，他们设法与狱中的杜润滋（1930年5月，中共顺直省委派原中共北平市委领导成员、组织部长杜润滋来宁夏省城开辟工作，恢复和建立党组织。来到宁夏省城后，杜润滋以在宁夏中学任教为掩护开展工作，并建立了中共党组织。1930年11月被捕入狱。）取得联系，不断向杜润滋汇报外面的情况。杜润滋与他们共同分析了全国和宁夏省城的形势，认为全国的革命形势已由低潮转入高潮，各地相继发生暴动，党所领导的根据地也在不断扩大。宁夏省城青年学生经受过大革命的洗礼，有一定的政治觉悟，马氏家族盘踞甘宁两省，欺压人民，不得人心。杜润滋对他们说：“当前首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抓枪杆子，掌握地方武装，等待时机，组织兵变，参加陕甘红军， 就红色政权。“杜润滋秘密发展李天才为中共党员，指示李天才回中宁县宁安堡到地方部队参军， 待机策动兵变；指示梁大均等人做马鸿宾部队和其他杂牌军的工作，待机策动兵变。1931年12月22日凌晨，李天才带领中宁县的100余名壮士摸进宁安堡南洋行，冲向马鸿宾部特务营一二连连部，欲夺取枪支，发动兵变。但由于缺乏经验，兵变失败。李天才被捕， 被押往宁夏省城监狱。

护路队兵暴失败后，梁大均等人决定在宁夏省城提前发动兵变。但由于学生缺乏严密的组织，起事日期泄露，当梁大均派李振邦等人到掌政桥联系部队起事、提取埋藏的枪支弹药时，骑兵连已被解除武装，人员被看管起来，埋藏的枪支弹药也被敌人挖走，李振邦等人被捕。小南门兵变遂告失败。

这一时期的革命活动均由于学生缺乏组织经验而失败，但革命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探索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和失败，但革命者可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为日后的革命事业奠定基础。 （据银川党史网）